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民间立场 建设态度 专业视野

智库的作用：

以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为例

总主编 周洪宇 潘启胜 万智

本册著者 周洪宇 邓凌雁

全球视野 中国立场
专业能力 实践导向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民间立场 建设态度 专业视野

智库的作用：

以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为例

总主编 周洪宇 潘启胜 万 智
本册著者 周洪宇 邓凌雁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库的作用:以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为例/周洪宇,潘启胜,万智总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3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

ISBN 978-7-5564-1258-7-01

I.智…
II.①周… ②潘… ③万…
III.高等教育-慈善事业-基金会-研究-美国-现代
IV.D7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1953 号

智库的作用:以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为例
ZHIKU DE ZUOYONG;YI MEIGUO KANAIJI JIAOXUE CUJIN JIJINHUI WEI LI

出品人	方平		
责任编辑	胡源	责任校对	刘慧芳
装帧设计	牛红	责任督印	张遇春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教育出版社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汉市硚口区长风路 31 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64-1258-7-01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 027-83637493 进行调换)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顾问委员会

主 任 顾明远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敏 朱永新 刘传铁 杨宗凯 张 力 庞丽娟 顾海良 谈松华
路 钢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 周洪宇 潘启胜 万 智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必学 王池富 方 平 方向荣 方晓波 叶 平 申国昌 付 睿
付卫东 刘来兵 刘国卫 李梦卿 杨 可 何 静 佐 斌 张 炜
张建林 陈冬新 陈光春 胡明亮 涂艳国 程斯辉 雷万鹏 靖国平
谭细龙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潘启胜

副主任 万 智 方 平 胡明亮 陈冬新

委 员 刘 艺 吴龙泉 范正田 李 镭 查 丹 刘书慧 陈 浩 王艳波
黄烨祁 胡 源 付 敏 黄 裳 刘 皖 孙亦君 杨 浩 赵 欢
董 娟

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是提升教育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总序

一、建设教育智库是推进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

智库（Think Tank）也叫思想库、智囊团，是为政府部门公共决策提供研究、咨询与服务，并通过宣传影响民众的专业机构，有政府“外脑”之称。智库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社会飞速发展，专业不断细化，各个领域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部门及决策者越来越难以应付这种复杂情境，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西方各国纷纷成立专业机构，专职进行政策研究，并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相关领域公共政策决策咨询和服务，如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世界范围内也成立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下属的各类专门机构、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以应对世界各国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共同问题。虽然不同的智库在组织规模、运转机制、资金来源、研究专长等方面有差异，但它们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即都试图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

教育智库作为智库的一个重要类别，在教育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世界上最早的教育智库是1905年成立的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教育智库是以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以教育专家为主、跨学科专家为辅组成，为各级各类教育决策者在处理教育方面问题时提供专业的思想、理论、策略或方法等。

“治理（governance）”一词，由世界银行于1989年首先使用，现今已成为政治、教育、医疗、卫生等公众领域中使用频率极高的名词。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调和不同利益冲突、形成联合活动的过程。这一概念被引入教育领域之后，教育宏观管理呈现出崭新面貌。教育治理成为一种新兴范式，立足于解决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病与不足。教育治理的主旨在于多主体共同平等参与对教育事务的管理，各类教育利益诉求将得到充分表达，各类意见、主张及争议都能得到充分展示、理解与包容。

教育毋庸置疑是公共领域，随着当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教育治理的架构和机制也在发生变化，治理结构从等级制向网络化转变，治理主体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

变。“治理”与“统治”“管理”最根本的区别是行为主体的不同，教育治理不仅仅由政府承担，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企业、学校、家长等也成为教育治理责任的共同承担者。包括政府、企业、个人等在内的教育利益相关者，平等参与到教育治理过程中来，协同治理教育领域的各项事务，在机制创新、规则制定、规划实施、资源投入、监督评价等方面相互协调。

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两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建设教育智库是推进现代教育治理的重要路径，是提升我国教育治理水平的重要保障。要提升教育治理水平，必然要求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建设。

二、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首先，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时代的发展提出了发展教育智库、推进教育治理的时代命题。G20 杭州峰会以“创新、活力、联动、包容”为主题，强调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已站在全球治理舞台中央，当前的形势迫切需要中国智库承担起时代重担。在教育方面，教育智库和教育治理正在成为一个亟须开拓和深耕的领域。

一个国家、民族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领先权、决胜权，除了有优越的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外，还必须拥有众多的高水平智库。因此，世界各国日益重视智库建设。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 21 世纪，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大规模普及与运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人类在享受当代物质文明的同时，面临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文化冲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健康问题、宗教问题、教育问题等日趋综合化、复杂化，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及作用显得愈发重要。中国于 2015 年年初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的智库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和富有实践经验的原从政人士等为主体人员的各类智库在应对全球化挑战，为政府提供咨询、影响决策、推动改革发展、参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智库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阐述“发展主线”时指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我国教育领域当前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制约，即多样化、高质量、能满足人们需求的教育供给稀缺，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立足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紧迫形势，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教育智库能为当今我国教育治理贡献什么？能在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和发展进程中起什么作用？

从国内需要和国外经验来看，教育智库将成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支坚实力量，它在教育政策建言方面可以发挥智库的咨政作用，贡献独立和客观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促进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在交流合作方面可以发挥智库人才优势和专业特长，增进与国外教育同仁的交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合作模式；在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中可以发挥教育督导和评估作用，维护教育评估的公正秩序，并以此为“突破口”，促进我国教育由“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转轨。

眼下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正向纵深推进。教育事关千家万户，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人民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政府部门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需要开放性和包容性，要做出科学的决策，必须依赖深入、扎实且“接地气”的科学数据分析，因此，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呼声越高，越离不开教育智库的建言献策。

当前，我国的教育智库在政府教育决策、教育改革、传播教育价值等方面的参与程度和力量贡献仍有待提高，在未来仍需要继续推进我国的教育智库建设，进一步发挥教育智库自身的优势，负起时代重担。

其次，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促进现代教育治理的客观要求。

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我国的教育治理体系能否通过自身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环境，关乎“十三五”战略目标能否圆满完成，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智库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教育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社会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专业型智库，是以教育领域重大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就世界范围来说，如何更好地参与和实施教育治理，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是当代各国教育智库发展面临的共同命题。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借鉴国外优秀智库建设的有益经验，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遵循智库建设的规律，按照自身的运行特点，明确职能任务、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我国的教育智库应抓住机遇，顺势所趋，主动作为——不仅要在推销思想、塑造公众舆论方面加强各种举措，使我国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等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而且要积极参与制定全球教育治理规则，增强在国际教育媒体和国际组织平台的话语权，把我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主张有效传播出去。在联动包容的全球教育治理格局中，既要体现大国担当，又要彰显中国立场和中国智慧。

当前，我国的教育智库“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例如在推进中

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智库、高校与政府三者的定位和边界有趋向模糊甚至彼此代替的趋势。按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的总定位，教育智库“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的基本定位，以及我们所理解的“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的具体定位，为了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治理的客观要求，必须继续加强中国特色教育智库建设。以新型智库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我国的教育智库目前还有很大距离，必须创新体制机制，努力打造国家“信得过、用得上、想得起、离不开”的中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

最后，研究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把它作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定位和新的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理也对我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这一切都深刻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型智库事业的信任、支持和厚望。教育部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2014年3月，出台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从多个方面对高校智库建设给予了明确指导。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意见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原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3年1月31日的全国教育科研工作会上，对新型教育智库（包括教育科研工作）的重要功能也曾作明确规定和阐述，那就是“创新理论、服务决策、指导实践、引导舆论”，具体来说，就是探索教育规律、创新教育理论；提出政策建议、服务教育决策；开发教育策略、服务教育实践；引导教育舆论、更新教育观念。这些对教育智库建设都有重要启示。

中共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为智库专家参与决策咨询开辟了广阔空间，为各类智库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在应对国内外环境挑战、破解发展难题、回应人民期待等方面都迫切需要强而有力的智库支持。

中共中央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提出明确要求，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具体在教育智库方面，就是要重视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以促进教育智库建设，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治理的客观要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好地培育培养各方面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充足而强大的教育人力资源支撑。

三、编写出版《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是长江教育研究院落实中央指示，发展教育智库、推进教育治理的具体举措

长江教育研究院（以下简称“长研院”）成立于2006年12月16日，迄今整整十年。它是为了贯彻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同志（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关于整合省内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湖北教育与文化产业的指示精神，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承办的，聘请我担任院长。它立足湖北、辐射全国、面向全球，开展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多种教育服务，努力探求一种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政策研究为重点、教育服务为支撑、出版企业为依托、政府和社会支持为后盾，“学、研、产、政、社五位一体”、优势互补、协同推进的新机制。这种研究机制与运行模式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和实际情况，试图走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新路，形成自己的特色。长研院成立十年来，通过新机制，凝聚了顾明远、陶西平、郝克明、朱永新、谈松华、张力、孙霄兵、劳凯声、庞丽娟、杨东平、曾天山等一批享有盛誉的知名教育专家以及中国移动研究院院长黄晓庆、英特尔教育总监朱文利等中外知名企业研究机构负责人，开展了多项有影响的活动，编写出版了一批重要成果，为湖北及全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努力。

长研院自2006年成立以来，尤其是2009年以后，每年3月初全国“两会”前都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北京·长江教育论坛”，专门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专家学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官员举行教育问题座谈会，并借此发布长研院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一般是围绕一个主题，提出10条左右建议，反映教育界和关心教育的社会人士的心声，并由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重要建议通过全国人大提交给有关方面办理，其中一些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批示，许多建言都

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我还有幸作为代表性人士被邀请到中南海参加教育问题座谈，直接向中央领导建言，推动教育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长研院还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出版年度《中国教育黄皮书》，对该主题情况进行总体分析，提出改进意见，并对当年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进程作出回顾、反思与总结，迄今已连续出版7册，成为颇具特色的系列教育黄皮书，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并于2014年10月获得《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2016年3月又首次在京发布“中国教育指数2015”，从规模度、投入度、质量度、公平度、贡献度、信息度、开放度、创新度、创业度等维度，对全国的教育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和监测，提出改进建议。根据长研院“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的立院准则，编辑出版《长江教育论丛》，为长研院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新的学术成果发表园地，它与长研院已有的年度《中国教育黄皮书》、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年度教育论坛互为增援，相辅相成。

2015年以来，面对近年来国际智库的蓬勃发展，中国崛起后对智库建设的迫切需要，以及中共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对建立中国特色智库的明确要求，长研院力求新形势下的转型升级发展，逐步将自身的定位，由原来的“教育政策研究与教育产品研发”发展到“教育政策研究智库、教育产品研发基地、教育咨询评估中心”，由原来的“一体（教育政策研究）一翼（教育纸质产品）”发展到“一体（教育政策研究）两翼（教育多媒体产品和教育咨询评估）”，由原来的“学、研、产、政一体化”发展到“学、研、产、政、社协同化”，由原来的“民间立场、建设态度、专业视野”发展到“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由原来的地方化、区域化发展到全国化进而国际化，开始迈上一个新台阶。

长研院在十年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为了提升自身能力和更好更健康地发展，必须以“教育智库”为担当，以影响政府决策为主要目标，以“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专业能力、实践导向”为基本原则，树立自身的责任意识，建设有特色、质量高、竞争力强、影响大的教育智库形象。为此，借十年院庆之机，从2015年5月开始，专门组织院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撰写出版《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就是大家辛勤努力了一年半的结果。

全套丛书一共10种，从主题和类型看，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国外教育智库研究，重点是对成立最早、发展最快、规模最大、成效最显、影响最大的美国教育智库进行研究，全面考察其兴起原因、发展过程、运行模式、基本特征、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和未来走向，为中国教育智库建设提供借鉴，这方面的论著包括《国际思想库：国外教育智库研究》（周洪宇、付睿、邓凌雁著）、《智库的作用：以美国卡耐

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为例》(周洪宇、邓凌雁著)、《大学新智库：以美国大学教育智库为例》(郭伟编著)等；二是中国教育智库研究，试图系统分析中国教育智库的产生背景、客观环境、发展历程、主要任务、运行模式、成绩不足和发展趋势，为教育智库今后的健康发展作参考，这方面的论著包括《智库的转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转型发展》(付卫东、付义朝著)和《新智库指数：中国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指数与绿色指数》(张炜、陈光春著)等；三是长研院自身研究，即对长研院十年成长过程进行回顾、反思与总结，介绍其建言献策的情况及其产生的效果，探讨今后的健康发展道路，这方面的论著包括《智库的成长：长江教育研究院的探索之路(2006—2016年)》(周洪宇、申国昌、陈冬新著)、《智库的力量：长江教育研究院历年教育政策建议书(2009—2016年)》(周洪宇、胡明亮、张建林编)、《智者的建言：长江教育研究院顾问专家国是建言集》(周洪宇、杨可、方平编)、《智者的声音：长江教育研究院院内专家国是建言集》(周洪宇、刘国卫、刘来兵编)和《智库与治理：周洪宇国是建言》(周洪宇著，上、下卷)等。该丛书依照从宏观到微观、从总体到个案、从理论到实证、从转型到创新、从国外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当下到未来的思路布局，回顾历史，关注现实，着眼未来。在参与这套研究丛书编写的专家学者中，既有年逾八旬的资深专家，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术骨干，还有充满活力的学术新锐。我的考虑是，长研院不仅要出一套该领域带有某种原创性的学术著作，也要带动和产生出一批教育智库和教育治理研究的优秀专家尤其是年轻人才，他们将是我国学术界的未来希望。

由于长研院的上述工作带有很大的探索性，很少有前人的成果可作依傍和参考，大家只能边思考、边研究、边撰写，考虑或有不周之处，编写或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专家指正。

再次向十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长研院发展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感谢，向一直参与长研院研究和讨论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谢意，向始终一起患难与共、坚守阵地、不离不弃的各位院内同志表示最大的敬意，向积极支持《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丛书》出版工作的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领导和编辑们表示由衷的谢忱！

周洪宇

2016年11月10日于东湖之滨

前言

智库与治理问题在 21 世纪全球化背景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016 年 3 月初,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克·甘(James G. McGann)教授及其团队按照惯例公布了《2015 年度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①。从刚刚发布的智库排行榜来看,今天的许多顶级智库不乏有叫作“基金会”者,如美国的“传统基金会”“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经济教育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德国的“康德拉·阿登纳基金会”;印度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南非的“自由市场基金会”;加拿大的“亚太基金会”;日本的“东京基金会”^②等。

实际上,不少慈善基金会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成为众多领域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基金会中心前主席弗兰克·埃默森·安德鲁(Frank Emerson Andrew)说:“慈善基金会是一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组织,拥有自己的资本金,由自己的受托管人或董事负责管理,其设立之目的是维护或资助那些服务于公共福利的社会、教育、慈善、宗教活动等。”^③慈善基金会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

①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克·甘教授可以说是一流的智库评估专家,他所率领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团队每年 3 月份左右发布上一年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

②日本“东京基金会”习惯上被中国学者译作“东京财团”,其前身是成立于 1997 年的日本“公益法人东京财团”,2010 年改为现在的名称。

③Frank Emerson Andrew.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M]. New York: Rusell Sage Foundation, 1956: 11.

力量,其影响不可小觑。资中筠教授认为美国渐进的改良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私人的公益事业^①,她甚至把基金会视为与美国政府的改良措施和公众批判并列的、促进美国20世纪渐进改良中的三大力量之一^②。基金会作为一种慈善系统在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着,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职责,向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援助。众多基金会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并不是在于捐赠行为的万金挥洒,而在于它们发展愿景中坚定地植入了对涉及公众利益的诸多要素的追求,比如教育、科学、和平、人类健康、绿色环境等。许多慈善基金会在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发展演变中,注重维护公众利益,默认公众福祉,推进自身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从而,一些卓越的基金会慢慢笼络了高端的人才资源和政治资源,明晰了独特的专业目标领域和发展思路,形成了他们独立的政策导向和政策研究输出。

不得不说,不少基金会扮演着“智库”的重要角色,它们正在通过对国际、国内问题展开政策导向的研究、分析和建议,引导舆论,影响公众,左右政府政策——智库形态的众多基金会作为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把政策研究、政策倡导和政策制定作为工作重心,识别、阐释和评估国际或国内的重大事件或重要议题,并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前提下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建言,发出正式或非正式的可能影响决策的报告、见解、证据、策略等。

尽管在组织结构、运作模式、目标受众和市场以及资金来源上不尽相同,可慈善基金会和智库之间还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当今西方一些发展成熟的教育智库往往又脱生于慈善基金会,如前面提到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卡耐基和平基金会、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等。

就教育慈善基金会和教育智库而言,如果细而思之,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一些让人好奇的问题:

随着时代和社会转变,教育慈善基金会的理念和实践发生了怎样深刻的变革?

教育智库何以影响教育政策制定?

如何看待教育智库在公共政策参与中的合法性问题和可行性?

发端于慈善基金会的一些教育智库,如何一步一步成长、蜕变,实现其职能变革的?

①资中筠. 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3.

②资中筠. 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些问题,本书以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为例,研究该教育智库的产生、发展、运作以及它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探索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从成立伊始的现代慈善基金会到今天的顶级教育智库的发展之路。本书历史地考察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产生、发展、演变和转型,基于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改进工作等多重视阈来回答上述问题,并对中国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报纸、广播等媒体的蓬勃发展,一些分散的、地方性的媒体或私人团体得以有条件突破地域和距离的限制,宣传其主张和扩大其影响。在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在社会各个领域探索变革。民主、进步、科学等信念在美国公共生活领域的扎根,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些社会冲突和政策失效等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精英对公共政策的理性决策是国家进步的保障^①。所以,20世纪初,美国社会开始出现一股新的社会力量,慈善基金会、非营利性公司、综合性或专业性智库等非政府组织又被称为除行政、司法、立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或除经济、政治、法制、舆论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对美国社会改良进程中令人瞩目的私人公益事业,资中筠也评述道:“它(基金会)对20世纪美国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②

1905年,美国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安德鲁·卡耐基斥资1000万美元捐建了慈善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其创建的初衷是为大学教师发放养老金。1906年,该基金会章程规定,“为美国、加拿大自治领和纽芬兰的大学、学院和技术院校的教师提供退休金,无论其在种族、性别、信仰以及肤色方面的差异”,“从更普遍的意义,在美国、加拿大、纽芬兰等地区,做一切鼓励、支持、提高教师职业地位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所必需的事”,“接受和保管以礼赠、遗产、遗赠、资助,或任何不动产与个人财产等形式提供的捐赠,所有这些都用于该法人组织的上述目的”。组建章程既反映了为大学教师提供捐赠的慈善性和公益性,又反映了亨利·普里彻特、查尔斯·艾略特^③等教育界一流改革家革新美国高等教育的宏大志向和长远追求。继1905年获得纽约州特许状后,1906年3月19日,该基金会又获得美国国会颁发的特许状,并将基金会名称改

①Ellen Condliffe Lagemann. Private Power for the Public Good: A History of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M].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xiv-xv.

②资中筠. 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5: 3.

③查尔斯·艾略特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期内曾对哈佛大学进行了广泛地改革。

定为“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扩大了基金会的使命，加入了“教学促进”的新方向。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以下简称“教促会”）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运作型基金之一，从其早期开始就发挥着一定的教育调查研究和政策倡导的功能，尤其是1918年教促会主导创建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简称TIAA）之后，便将有关养老金事务逐渐转交给TIAA，教促会则主要从事高等教育问题与政策研究，逐渐发展为如今在全美乃至全世界都知名的非营利性教育研究与政策中心。教促会的教育调查和教育政策研究，一方面离不开教育界锐意进取之士的参与，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教促会作为自觉的教育调查和教育政策研究的牵头人、倡导者、合作者、传播者，在科学实践和客观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调查报告和教育政策建议。这些教育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议对美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创立 001

 第一节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产生的背景 003

 一、社会背景 003

 二、教育背景 005

 第二节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创始人——卡耐基 008

 一、卡耐基：从钢铁大王到社会慈善家 008

 二、《财富的福音》与理性慈善风格 014

 第三节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第一任会长——普里彻特 020

 一、普里彻特：从天文学家到教育改革家 020

 二、“效率的福音”与管理哲学 024

 第四节 慈善基金会的筹备工作 026

 一、斯克堡城堡的冲动 026

 二、养老金方案设计 028

 三、“寻找适合的人” 031

第二章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早期发展(1905—1930 年)	035
第一节	从捐助型到运作型基金会的转变	037
	一、1905 年“卡耐基基金会”的组建	037
	二、1906 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转变	039
第二节	开展专业教育领域的系列研究	040
	一、《弗莱克斯纳报告》	041
	二、《律法公众职业训练》报告	048
	三、《工程教育》报告	051
第三节	“卡耐基单位”的应用与影响	053
	一、“卡耐基单位”产生的背景	053
	二、“卡耐基单位”的设定和发展	055
	三、“卡耐基单位”的影响	057
第四节	大学教师养老金系统的发展	058
	一、养老金系统认可标准的规范化	059
	二、养老金系统覆盖面向公立高等院校扩展	061
	三、从免费型养老金向分担型养老保险的蜕变	063
	四、教师保险和年金协会的独立和发展	065
第三章	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进一步发展(1930—1979 年)	067
第一节	教促会经历财政困境后复兴	069
	一、教促会危机(1930—1966 年)	070
	二、教促会走向复兴(1966—1979 年)	071
	三、第六任会长阿兰·皮菲的“准非政府组织”观点	073
第二节	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1967—1973 年)	076
	一、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变化	076
	二、“科尔委员会”的创建	078
	三、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运作	081
	四、第一份报告——《质量与公平：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新	